

Ⅶ. 经济理论研究概况

一年来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概述与展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朱铁臻 陆南如

1982年,是我国经济调整与改革取得显著成效的一年。国民经济走上了持续、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制订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实现战略任务的一系列正确方针政策,使全国人民明确了近期和远期的奋斗目标。新的形势向经济理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一年来,围绕着经济科学为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服务的总方向,经济理论界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提出和遇到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并取得一定进展。现将几个主要问题概述如下。

一、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

研究和制订正确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它现在已经被提到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广大实际工作者们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战略目标以后,更大大推动了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

所谓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简要地说,就是指一国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整体的发展目标、战略重点以及为实现战略目标而规定的总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步骤和根本性的措施。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战略以及广泛展开战略目标实现对策的研究,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满足人民生活逐步提高的要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一年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有所进展。

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首先是,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决不是单纯追求高速度,而是要讲究经济效益,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特征和方向。许多同志认为,对于以经济效益为根本出发点制订的我国经济发展的十条方针,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标志。它的基本内容是:由偏重产值、速度的要求,转变为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由以往片面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转变为把发展人民吃穿用住行的消费品摆在重要地位;由以往扩大生产主要

依靠新建企业,转变为主要依靠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由以往闭关自守,转变为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通过国际交换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有的同志强调指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的本性;适合于发展社会主义的要求。它必须以改善劳动者的生活、增进他们的幸福为目标;必须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基本制度的巩固,同时又包括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行政体制进行改革的内容;它的实施必须依靠全国人民的努力,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真正发挥出来;实践战略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集中代表他们的利益和意志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党和党领导下的政府。因此党的领导作用的加强,劳动者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在管理国家、管理企业中劳动者作用的提高,国家和社会生活向高度民主的发展,是战略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

其次是,要从我国国情出发,遵循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来确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国情不仅包括自然环境、人口、经济发展状况、科学教育文化发达程度,而且包括社会其他各种重要情况,比如各种社会关系、各种社会矛盾以及旧中国遗留的东西和建国以来所发生的变化等等,这需要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摸清摸准。遵循经济规律的要求不仅指生产关系运动的规律,而且包括生产力运动规律。由于我们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发展战略,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尤其需要注重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它包括许多具体内容,如食品、衣着、房屋、交通工具、教育、保健、娱乐以及政治生活民主化、社会安定、道德面貌等,也就是要达到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确定的战略目标体现着这个要求。

第三,越来越多的同志赞同用某种综合指标体系来作为发展战略的目标,逐步代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其它某个单一指标的主张。这样的指标体系,至少应当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标志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指标,标志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物质生产增长的指标,标志人口再生产状况的指标。党的十二大确定以工农业总产值作为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这是考虑到这个指标用起来比较简单方便,又为大家所熟悉。如果换用其他指标,我们统计工作的基础和大家的习惯还不能马上适应。但是这种指标的缺陷是很明显的,必须要用其他指标相制约。

目前讨论中,分歧比较大的主要问题:一是,对发展战略概念的内涵还有不同理解,对于经济发展战略的对象,表述上很不一致。有的同志认为,发展战略的内涵应当包括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对外关系与发展、发展的途径。有的同志认为,发展战略是社会发展的手段,并非目的。二是,在农业发展战略上,存在着大农业发展战略与小农业发展战略之争。前者强调“大农业、大粮食”,认为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商业、虫业、微生物业、副业和部分加工工业、商业都包括在大农业里;凡是能吃的东西都应被看作是粮食,主张调整农业结构。综合运用现代化科学技术,发展多种经营。后者强调必须把粮食生产放在农业发展战略的首要地位,起着基础的作用,要在保证粮食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多种经营。现在这个问题认识尚未统一。三是,对发展战略指标体系的评价标准上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用生产关系的演变、经济效益的状况、经济结构的演变、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状况来评价各个阶段的发展战略。有的同志认为,不能单纯以物质产品的多少为准,而应当从关心人、培养人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的评价标准,等等。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涉及面很广,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许多方面尚待深入探讨。除了要继续探讨总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外,还要对部门 and 地区的发展战略,如农业发展战略,能源、交通发展战略,城市、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战略以及部门、地区发展战略与总的

发展战略的配合、衔接、协调等问题展开广泛地探讨，同时要加强实现战略目标成套对策的研究，没有成套的对策，战略目标也不可能实现。

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问题

通过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人们日益深刻地认识到，经济体制的改革必须在基本理论问题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理论问题搞不清楚，实践必然带来很大的盲目性，甚至会产生政策上的不稳定性。因此，从1982年初开始，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和国务院经济中心，共同组织和发动经济理论工作者和经济工作部门的同志，就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问题展开了讨论。重点是讨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因为正确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经过几个月的讨论。比较多的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是计划经济，而这种计划经济又是同商品、市场相联系的。它们二者可以统一起来，而不是截然对立的。因此，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这是社会主义经济本质属性的要求。对于如何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作了精辟阐述。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也就是说，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由国家统一计划出一定的范围，由价值规律自发地起调节作用。这一部分是有计划生产和流通的补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有益的。为了使经济的发展既是集中统一的又是灵活多样的，在计划管理上需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形式。对于国营经济中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和分配，尤其是对于关系经济全局的骨干企业，必须实行指令性计划。对于集体所有制经济也应当根据需要下达一些具有指令性的指标。除了指令性计划之外，对于许多产品和企业要实行主要运用经济杠杆以保证其实现的指导性计划。可以说，这是对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问题的讨论作了全面的总结。

当然，这不是问题讨论的结束。目前，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还有许多问题并没有透彻地说明和具体地解决，还需深入讨论研究。首先是，怎样科学表述社会主义经济。大体有两类意见：一类意见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是计划经济，不是商品经济。有的表述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有的称为“商品性的计划经济”或“商品型与产品型相结合的计划经济”等等。另一类意见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有的说，社会主义经济既是计划经济，又是商品经济，两者都同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有密切联系。社会主义条件下，既然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也就是存在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但不能简单地商品经济说成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怎样看待社会主义经济，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统一认识。

其次，如何认识计划经济的本质特征。有的同志认为，指令性计划是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计划经济的基本形式。指令性计划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种标志。只有坚持指令性计划，才能使国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统一起来，促使全民所有制经济主导地位不断加强，才能有利于提高社会经济效果，促使技术进步，才能划清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界限。有的同志认为，计划经济是为克服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提出来的，它的本质特征，是通过预先的计划安排，自觉地实现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至于采取什么方式实现按比例发展，那是具体方法问题。根据实践经验，比较多的同志主张多种计划指导方式比单一指令性计划能够更有效地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使计划经济更加完善，更加

有效。

第三,怎样确定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和界限。主要的问题是:按照什么原则来划分指令性计划调节的范围。这个问题明确了,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就比较好划分了。对划分指令性计划的范围,目前大体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是按企业来划分。大型企业或全民所有制企业下达指令性计划。第二种意见是按产品来划分。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下达指令性计划,由国家统配调拨。再一种意见是按照任务的重要程度来划分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即国家重点任务需要的物质,不管是重要产品还是一般产品,也不管是大型企业生产的,还是中小型企业生产的,原则上都由国家下达指令性计划安排生产,产品统一分配。至于怎样确定国家重点任务的范围,可根据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由国家加以规定。对市场调节的范围也有不同看法,有的主张把利用经济杠杆实行计划管理的产品都看成市场调节,显然是划得过宽;有的认为市场调节只限于不便统一计划管理、产值小、品种繁多,由小企业和个体劳动者生产的小商品,这又显得太窄。如何划分比较合适,需要确定几条大的杠杠。

除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一般理论问题外,还有一些专题性的问题,亟需展开讨论,比如改革价格体系、劳动工资制度、商品流通、财政税收问题等等。总之,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勇于探索,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新路。理论问题讨论的深入,必将推动改革的前进;同时,通过改革的实践,认真试点,系统地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又会使理论认识进一步深化。二者是互相促进的。理论的探索,眼光要放远一些,考虑问题的范围应该大一些。改革的每一项具体实践则要贯穿出效益、出速度、出人才、出财源、出精神文明的综合目标。改革要有周密的规划和准备,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切忌一窝风、一刀切。

三、经济效益问题

提高经济效益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核心问题。党的十二大进一步强调,必须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并且把它作为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前提。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中,人们日益深刻认识讲求经济效益的极端重要性。经济理论界,经济工作部门和地区,包括一些企业的领导人,普遍重视这个问题。一年来讨论的进展,主要是把提高经济效益同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统一起来,坚持经济效益与增长速度的统一;对经济效益的概念以及提高经济效益的途径作了更深入的研究。

不少论著分析了经济效益的状况,认为片面追求产值和速度,忽视经济效益的做法已开始注意纠正;尤其随着国民经济调整与改革的顺利进行,工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也有所提高。但从总的情况看,经济效益差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到本世纪末能否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关键在于提高经济效益。只有提高经济效益,才能求得一个实实在在的发展速度。翻两番,不是单纯追求产值,而是要实现速度与效益的统一。有的同志指出,速度与效益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但是,经济效益对速度起决定作用。我们所要求的生产速度,是指产品在优质、低耗、有销路基础上的速度。最佳的经济效益,必然导致最优的速度。有水份的速度是对社会劳动的浪费,不是真正的速度。我们应当以最佳的效益,求得最优的速度;以最优的速度,取得更大的效益,以保证生产持续稳定地按比例地发展,人民从经济增长中得到实惠。当速度与经济效益之间发生矛盾时,速度应当服从效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片面地追求速度。翻两番,必须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子。

对于经济效益的含义也展开了讨论。有的同志认为,经济效益的含义,大致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物质效果,就使用价值形态来考核,包括物质资源的节约与合理利用,环境和自然生态的维护,产品的品种、质量及其实际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等等,二是经济利益,就价值形态来考核,包括劳动的消耗,劳动的占用,具体来说,就是产品的成本、资金的占用、产值和利润的高低等等。有的同志认为,经济效益概念的基础和核心是符合社会需要,这是经济效益的目的所在。经济效益的有无,决定于经济活动的结果能否满足社会的需要,经济效益的大小,则以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来衡量。它可以用实物形态,也可以用货币形态的指标来表示。有的把社会主义经济效益的基本特征概括为:1.宏观性,本质上是宏观经济效益;2.计划性,按照完成国家计划情况作为衡量经济效益的尺度;3.综合性,既要重视使用价值的生产,符合社会需要,又要节约劳动消耗,使企业的利润和职工的收入尽可能提高。

经济效益与经济效果是相同的概念,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的认为两者的内涵没有什么区别。有的认为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两个概念。“经济效果”是人们进行某一社会实践活动的所得和所费的比较,“经济效益”则是指所得和所费互相抵消以后的纯收益。有的同志主张,为了避免经济效益、经济效果在概念上造成混乱,把表示所费与所得的余额多少称为“经济效益”,而表示取得同样的效益所耗费的劳动量多少,也就是经济效益与劳动消耗之比,用“劳动有效性”一词来代替。但有的同志持不同意见,认为不必再创造一个新词。

如何提高经济效益,讨论较多。普遍认为,根本性的问题是要积极有步骤地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同时要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基础结构、各产业部门的内部结构、技术结构、产品结构以及企业结构的调整;改变扩大再生产的方式,切实从外延为主的扩大再生产转向内含为主的扩大再生产,搞好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全面整顿;健全和完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提高经济效益的当务之急是发掘人才、培养人才和合理使用人才,发挥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有的同志认为,提高经济效益,在思想上必须牢固树立价值观念,自觉地按价值规律办事。片面追求产值,追求速度,不惜工本,不讲经济核算,不问市场需求,不考虑价值实现等等不顾经济效益的表现,其思想根源都是与缺乏价值观念,忽视价值规律作用分不开的,这也可以说是造成我国长期以来经济效益差的一个重要思想理论原因。

关于经济效益的上述问题探讨,无疑对端正我国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和实现宏伟战略目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经济效益问题涉及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到经济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从这个意义来看,目前的讨论,只是一个序幕,许多方面还将深入探讨。既要重视经济效益的基本理论的研究,又要加强经济技术应用的研究,并且要完善评价和考核经济效益的指标体系,建立和健全一整套保证和促进提高经济效益的论证、考核制度和工作体系。要围绕研究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带动经济学的发展和自然科学水平的提高与技术进步,从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四、农业发展战略和农业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党的十二大指出,实现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战略任务必须把农业放在战略重点的首位。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对我国农业发展战略和农业体制改革、农业专业户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大家认为,研究农业发展战略,首先要明确农业的战略地位。这是农业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现在党中央已明确指出,振兴中华首先就应振兴农业,应以这个指导思想来研究农业发展战略。并认为要搞好农业发展战略,农业本身也有一个战略重点的转移问题。当前主要

应做到：1. 从不断变革农业生产关系，促进农业生产力的战略思想，转移到主要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战略思想上来；2. 要从实质上是单一经营、自给自足的战略思想，转移到多种经营、发展农业商品经济的轨道上来。

对于我国农业发展的战略步骤，有的同志提出应分两步走，前十年，争取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5%，为农业大发展准备必要的条件；后十年，较全面地开展农业现代化建设，争取每年递增5.5%，达到“小康”水平。

对于实现农业发展战略途径问题，大家认为，我们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途径是在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基础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与此同时，要进行农业生产改革和农村产业结构的改革。要从单纯抓粮食生产，转向要同时抓多种经营，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道路；要逐步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

对于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性质和客观必然性，以及如何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等问题。大家还从理论上进行论证。

多数同志认为，我国以农户为经营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分田单干。认为这种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适合我国特点的，它是农民群众多年实践的选择，反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这一客观规律的要求，因而具有存在的客观必然性。除过去常谈到的原因外，主要提出以下两个方面的依据：

(1) 我国社会家庭血缘关系的相对稳定性。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是以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组织形式；同时由于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基本上仍是分散经营，主要是手工操作。因此，这种形式比较容易被农民群众所接受。

(2) 由于我国目前农业生产水平较低，不适宜搞过于集中的大生产，同时由于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很大，需要农业劳动者经常随机应变，及时作出反映和决策。这种情况要求农业经营者和生产者尽可能直接结合，因此以农户为经营单位比较适宜。另外农业生产具有多种经营的特点，以农户为经营单位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有利于多种经济的发展。

大家还就目前以农户为经营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否能适应今后农业现代化的要求进行了讨论。认为实践证明，实行联产承包制以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高，迫切要求逐步实现农业科学化、水利化、机械化。因此这种组织形式的“弹性”很大，它既能适应较低生产力水平的要求，也能适应今后农业现代化的要求。

关于如何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大家认为主要是要处理好这样两个关系：一是生产队与生产责任制的关系。一种意见认为农业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管理形式，因此，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生产队仍应继续存在，关键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生产队与社员之间的关系。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生产责任制不仅是一种管理形式，而且是生产关系的调整。因此主张搞得好的生产队可以保留，但完善生产责任制不应在强化生产队上作文章。二是统与分的关系。有的同志强调生产队统一的方向，认为统是农民群众的要求，但统不是再回到过去老路上去；有的同志则认为当前强调分而不应强调统。强调统对发展生产责任制没有好处。

对于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经济上是把我国农村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专业化、多样化、商品化和工业化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当前农村专业户的发展，对我国农村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它是我国农村出现的新事物，是在“双包”的基础上产生的，继承了“双包”的优点，同时又有专业分工的特点。农村专业户的发展体现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社会化的特点，是我国发展农业商品生产的方向，具有必然性和长期性；专业户的发展要走上联合，可以说，这是我国建立在较小型经营单位基础

上的农村商品生产经济的雏型，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而能够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走向联合化大生产，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和特征。

此外，对于农业计划管理体制、农村商业体制改革、农业经济效益问题等也进行了讨论研究，但目前讨论尚有待深入。对于如何既根据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又结合中国实际，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合作经济，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亟待探讨。

五、按劳分配和工资制度改革

按劳分配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它涉及每个人的物质利益，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的消费状况和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正因为按劳分配是个重要又复杂的问题，所以长期来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

打倒“四人帮”以后，经济学界就按劳分配问题展开了讨论，召开了四次全国性的讨论会，肯定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在认识上基本趋向一致，认识到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就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但是，在什么是按劳分配，如何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等问题上，仍有不同看法。

马克思认为，按劳分配是以劳动作为尺度的，对这一点大家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但这个“劳”指的是什么？却存在着不同看法。有的认为，按劳分配的“劳”是劳动三种形态（潜在形态劳动、流动形态劳动、凝结形态劳动）的综合。在确定劳动者报酬时，应考虑潜在形态的劳动，把技术等级、职务、职称等作为依据，可以促进劳动者提高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考虑流动形态的劳动，把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劳动艰苦繁重等作为付给报酬的因素，可以鼓励劳动者积极劳动；考虑凝结形态的劳动（即为物化形态劳动），使报酬多少取决于完成劳动定额的情况，可以有利于促进劳动者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提高经济效益。有的认为，按劳分配的“劳”只能是物化形态的劳动。因为作为生产过程的四个环节之一的分配，本来是产品的分配。按劳分配是产品分配的一部分。而产品是劳动的结晶，是对象化凝结化的劳动。所以，按劳分配的“劳”应是物化劳动。按劳分配，实际上是按有效劳动分配。而流动形态的劳动则没有考虑劳动的有效性。还认为潜在的劳动形态，这个提法本身，就成问题。劳动是现实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劳动力的现实使用。现实与潜在不可能合二为一。因此，劳动根本就不可能有潜在的形态。从而也不能作为确定劳动报酬的根据。

在讨论中大家还提出按劳分配是谁对谁进行分配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按劳分配有两个层次，一是国家对企业实行按劳分配，二是企业对劳动者个人实行按劳分配。持这种意见的同志认为，虽然马克思所讲的按劳分配是社会对劳动者个人，但他的前提是社会所有制，而不是现在情况下的公有制。其次，由于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生产，劳动者的个人劳动只有经过企业联合劳动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为社会所承认。这就有个社会承认企业的联合劳动，并按企业联合劳动的有效性大小进行分配的问题。另外国家对企业实行按劳分配，不会产生苦乐不均。企业物质利益的多少是排除了生产的客观条件以后，由企业职工共同劳动贡献大小为根据的。如果各企业之间的职工，出现收入上的差别，这正是贯彻按劳分配的结果。有的则认为，国家只能对劳动者个人实行按劳分配，不能对企业集体实行按劳分配。其主要理由是：（1）马克思所讲的按劳分配是对劳动者个人，不是对企业集体单位；（2）按劳分配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实现，在同一公有制内部应实行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原则，如果国家对企业实行按劳分配，必然出现不同国营企业的劳动者同工不同酬的情况；（3）在社

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根据企业经营好坏，提留一部分利润给企业，这不是按劳分配关系，和按劳分配的“劳”是有区别的。

此外，还讨论了如何进一步贯彻按劳分配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工资是分配的具体形式。我国现行的工资制度，虽然初步贯彻了按劳分配原则，但与按劳分配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不少同志认为，我国现行工资制度存在的弊病是“低”、“平”、“乱”、“死”。“低”是指工资水平低；“平”是指工资关系上的平均主义；“乱”是工资标准乱；“死”是指工资管理体制过死。这四个问题中那个问题是主要的呢？对此，看法也不尽相同。但多数人认为在这四个问题中“平”是主要的。工资水平低，固然会使按劳分配原则受到一定限制，但工资收入归根到底决定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我国现阶段人均国民收入较低，决定了工资水平低。这一点是不可能通过工资制度改革而迅速加以改变的。工资管理体制过死，确实会影响到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阻碍经济建设的发展。但“死”所涉及的，主要是工资管理方面问题，而“平”所涉及的，则是工资管理的内容和指导思想问题。过死的工资管理制度，往往是平均主义的指导思想的产物。工资标准的混乱只不过是一种现象，其实质在于不合理。“平”和“死”特别是“平”才是“乱”的根源所在。因此，克服平均主义，才是改革工资制度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不批判和克服平均主义，我国的工资制度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改革。

工资制度的改革，是一件非常复杂而艰巨的大事，涉及的问题很广泛。当前主要就工资制度改革的方向目标和工资改革的内容进行了讨论。大家认为，工资改革的方向，总的来说，就是要使各类人员之间的工资关系更加符合按劳分配原则，以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益，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工资改革的内容，主要是改变国家卡得过死、统得过死、高度集中统一的工资管理制度。在保证国家对工资进行有效的宏观控制前提下，把工资管理权适当地下放给地方、部门和企业。实行一种国家、地方和企业分级管理的工资管理体制，以利于因地、因时、因人制宜的处理工资问题。但究竟如何改，权力下放多大，存在着不同看法。

对于工资结构、工资标准、工资形式等问题，尚需专门研究。

六、生产力经济学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生产力经济学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继1980年11月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生产力经济学学术讨论会之后，1982年又召开了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许多同志认为，长期以来，在经济学领域里，只重视对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研究，片面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忽视对生产力自身运动规律的研究，对经济建设产生着不良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同志主张，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经济科学体系中，应当建立以专门研究生产力发展规律为对象的生产力经济学。一年来，围绕生产力经济学的性质、生产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生产力运动规律的内容、生产力经济学与其他经济科学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生产力经济学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科，它与其他经济学科是怎样的关系，经济理论界存在不同认识。有的同志认为，生产力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力的运动规律，主要阐明生产力的规律性、理论性问题，这就决定了它具有理论科学的性质。但由于社会生产力本身及其运动的特点，又决定了它具有比一般理论科学更显著的实践性。有的同志认为，生产力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具有两重性：既有理论基础学科的性质，又有应用学科的性质。相应的，生产

力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也包含两方面：既有基础理论学科的内容，又有应用学科的内容。

有的同志指出，生产力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一起构成经济科学体系中的基础学科。前者以生产力为研究对象；后者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两者紧密联系，但不能互相取代。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已经成为头等重要任务的今天，更需要加强对生产力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但也有少数同志不赞成把社会生产的两个基本方面分割开来，建立与研究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相并行的生产力经济学。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可能截然分开，如果离开了生产关系去研究生产力经济学，那就会把生产力经济学变成一门纯技术科学，而不再是一门社会科学了。如果说生产力经济学可以算作一门独立的学科，那末，它也不过是象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财政学、商业学等等部门经济学一样，它不过是研究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在某一具体部门中的具体化而已。有的同志主张建立单一的全面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的经济运动的理论经济学。

多年来一直存在着的关于生产力构成的“二因素论”同“三因素论”之争，近年来有了突破，提出了生产力“系统论”的观点，并且日渐条理化和深化。这可以说是生产力理论研究的一个进展。有的同志认为，生产力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的状况，是属于不断发展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之中的生产力；因此，形成生产力的因素和结构不是万古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动并且日益复杂化。我们不能把各个时代差别极大的各种生产力硬塞进一个“二因素论”或“三因素论”的固定模式中去。一些同志还指出：生产力不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几个因素机械相加，而是诸生产因素有机组合而成的一个“系统”。社会生产力作为一个系统，具有“强烈的集合性”、“密切的关联性”、“特殊的数量规定性”、“明显的总体性”。生产力的合理组织是包括结构经济、布局经济、规模经济和运营经济在内的巨大的系统工程；不同阶段上的生产力有不同的质的规定性。生产力诸因素不仅有着空间上的结合问题，还有着结合中的时间制约关系，有着生产力因素新陈代谢、替补更新的问题。有的同志提出，我们应当运用动态考察和系统分析的方法，深入研究影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制约关系，从而揭示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

对于生产力规律性问题的探讨，近年来也有进一步的论述。有的同志认为，社会生产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支配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生产力发展的总体规律与局部规律、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它们形成一个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规律体系。有的同志提出了生产力运动的五条规律：1. “因素结合律”，揭示生产力诸因素按一定方式结合的关系；2. “技术适应律”，揭示生产力诸因素之间的技术关系；3. “实物偿还律”，揭示各相对独立的生产机体之间的物质循环与物质变换的关系；4. “数量比例律”，揭示生产力诸因素之间相互结合以及各生产机体之间进行实物偿还的数量关系；5. “因素转化律”，揭示生产力诸因素之间的相互转化关系。

不少同志指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客观上迫切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四化建设中的农业、工业现代化本身直接就是生产力，科学技术现代化也有一部分直接是生产力，因此，生产力经济学理所当然地要比其他经济学科更直接更紧密地为四化服务。有的同志说，生产力经济学在为国民经济调整和经济结构合理化服务，为我国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服务等方面，都大有用武之地。如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生产力布局）、规模结构、技术结构、产品结构等等都直接是生产力经济学的研究课题。

1982年9月，召开了全国不发达地区生产力发展问题讨论会，从总结不发达地区三十多年来生产力发展的经验教训，全面分析不发达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入手，探讨了这类

地区今后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与措施,这对促进我国生产力的协调、平衡发展是有现实意义的。

总的看来,生产力经济学学科建设,近几年的进展较快,许多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积极投入有关生产力经济学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但是应当看到,生产力经济学毕竟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它的范畴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因此,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还很多,任重而道远。

一年来,经济学界除讨论以上问题外,还讨论了商业体制改革、综合财政、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生态经济学、劳动就业等问题。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概述。

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努力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为实现党提出的宏伟战略目标而奋斗。经济科学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面临着繁重任务,许多重大课题需要我们深入的研究,并在理论上加以概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通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围绕提高经济效益,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以促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总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向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发出了召唤,开辟了广阔天地。我们要振奋精神,不畏艰难,勇于探索,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实现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沉痛悼念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年鉴》编委孙冶方同志



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年鉴》编委孙冶方,因肝癌医治无效,于1983年2月22日下午5时05分,在北京与世长辞了,终年75岁。1983年3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举行了孙冶方同志纪念会,沉痛悼念孙冶方同志。下面刊登梅益同志在会上的讲话,介绍了孙冶方同志的革命经历和学术贡献。为了纪念孙冶方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卓越贡献,表彰和鼓励对经济科学作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还设立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

纪念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

梅 益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中国共产党的模范党员、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让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各位简要介绍他的革命经历和学术贡献。

孙冶方同志原名薛萼果，1908年10月24日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初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即担任了无锡党支部第一任书记，这时他年仅15岁，就积极从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1925年，他受党组织的派遣，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毕业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讲课翻译。1930年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积极参加组织《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编辑《中国农村》杂志，在理论战线上对“托派”及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斗争。1937年9月以后，调任中共江苏省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后来还担任过中共华中局宣传部宣传科长、中共华中局党校教育科科长、淮南路西地委宣传部部长、苏皖边区政府货物管理局副局长、华东财经办事处秘书长、山东省政府实业厅副厅长职务，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经济部门的领导工作。1949年建国后，曾任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重工业处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务。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他先后以实际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的身份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真知灼见的观点。在“左”的指导思想下，他受到错误的批判。1977年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1982年9月，孙冶方同志抱病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孙冶方同志的一生，是在中国为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而不懈斗争的一生。早在三十年代，他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经济理论和中国社会的具体经济实践相结合，深入农村、工厂进行调查，分析了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驳斥了“托派”、王明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谬论，有效地捍卫了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四十年代，他在华中党校工作期间，针对党内存在过并还在一部分党员中继续存在着的经验主义倾向，强调了理论的重要性，提出要重视和加强对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许。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他在周密调查研究和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中肯地分析了我国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和某些经济政策的失误，在经济学界较早地对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认为：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去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键，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调整、改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他把正确处理国家集中领导和企业独立经营的关系作为经济改革的中心问题提出来，强调在计划经济中要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要正确运用经济杠杆，提高利润指标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要扩大并适当规定企业经营管理的权限，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加强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等等。为了推进改革，他坚持不懈地对在国内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有着广泛影响的唯意志论和自然经济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严肃认真地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领导经济研究所期间，特别是在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的过程中，为我国经济理论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经济学研究人才。

打倒“四人帮”后，他又积极地参加了理论战线上拨乱反正的斗争，广泛而深入地研究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尤其是1979年9月动手术后，他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仍然用全部精力关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继续进行创造性的经济理论研究工作，三年多来除撰写和整理《社会主义经济论》等3本著作外，还亲自动手写了23篇经济论文、两篇文艺评论、一篇党史资料。在他的经济文章中，对党在新时期经济方针的确

定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新见解。他提出的实现战略目标必须重视老企业的技术改造等意见,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和重视。孙治方同志以自己卓越的研究成果,推进了我国经济研究的深入发展,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孙治方同志是我国理论界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披荆斩棘的一位勇敢的无产阶级战士。他以自己的革命实践和卓越贡献博得了广大群众的敬仰,并在国内外经济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我们在纪念孙治方同志的时候,要学习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的无限忠诚,不管在任何困难情况下,他都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指导我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任何时候,他总是认真地钻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各种经济问题,摆脱陈腐的模式和框框的束缚,大胆地开展创造性的理论探索。

孙治方同志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他非常重视理论,但从从不把“原则”、“结论”当作研究的出发点,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虚心倾听群众的呼声,及时研究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

孙治方同志还具有勇于坚持真理的好品格。不管压力多大,他从不拿原则作交易,不说假话,不做假检查,他曾经身陷囹圄,但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的品德。他曾经说,“死不足惜,名声毁了也不要紧,但我长期从事经济研究形成的经济学观点决不能丢,我要为真理活下去!”这种不畏反动权势、不顾个人安危,勇于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斗争精神,为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孙治方同志一向具有严于律己的精神。他非常重视党性锻炼,他虽然多次受到错误批判和打击,但从不计较个人恩怨;他有很长的斗争资历,但从不计较个人名位;他具有深厚的理论修养,深孚众望,但从从不摆权威架子;他艰苦朴素,从不搞特殊化;他作风民主,平等待人,纯厚质朴,关心群众疾苦;他虚怀若谷,热情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商榷意见,公开放弃那些自己曾坚持过但已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或不完全是正确的学术观点;他十分重视对中、青年研究人员的培养和教育。

孙治方同志的逝世,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重大损失,是我国经济界的重大损失,也使我党失去了一位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纪念他,我们要学习他,同时要化悲痛为力量,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不断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积极开创经济科学研究的新局面,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涨。

设立孙治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缘起

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治方同志,1923年参加革命工作,为党的事业勤勤恳恳地奋斗了六十年,是我党的一位老前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孙治方同志早在三十年代,就在经济理论战线上对“托派”及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斗争。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他先后以实际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的身份,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真知灼见的观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不顾年迈病重,继续顽强地进行创造性的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对党在新时期经济方针的确定

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新见解。孙冶方同志以自己卓越的研究成果，推进了我国经济研究的深入发展，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为了纪念孙冶方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卓越贡献,表彰和鼓励对经济科学作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繁荣我国经济科学,特发起设立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

本基金来源、使用、管理等办法为：

一、基金来源。包括：孙治方同志遗作稿费（治方同志临终前遗言，他将来的稿费全部交给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决定将他的稿费全部交基金会）；发起人自愿捐献；有关机关、团体、报社、出版社和个人自愿捐献。第一步拟筹集十五万元。不向读者募捐。

一 基金使用。基金拟永久性地存入国家银行，以存款利息作为奖励金发给获奖者。

每两年评奖一次。1984年首次评奖。

三、评奖标准和办法。凡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有较大贡献的经济学论著，包括专著、论文、研究报告、调查报告、资料等，经评奖委员会评定，均可获奖。奖金标准根据奖金总额和评选作品多少另行规定。

先着重评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优秀的有创见的作品作为奖励对象，然后逐渐扩展到经济科学的各门学科。要特别注意发现中青年的优秀作品。

聘请若干专家组成评选委员会，评定获奖作品。评选工作要充分体现学术民主。评奖的具体办法另订。

四、基金管理。成立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委员会，负责基金的保管和运用。基金委员会下设办事机构，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办事机构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我们相信，我们这一有利于繁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倡议，一定会得到大家的大力支持和赞助。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发起人

薄一波 姚依林 谷 牧 张劲夫 (以下按姓氏笔划排列)

于光远 马洪 马宾 千家驹 王学文 石西民 冯和法 刘国光 刘瑞龙 汤季宏

连洛新 许 毅 孙怀仁 孙尚清 孙晓邨 李人俊 李成瑞 李 强 巫宝三 宋 平

计探制	计数	孙作仁	陈高情	陈统部	李六俊	李洪福	李三	李翰笙	张卓元
牛涛	呈大琨	呈敬农	汪道涵	陈先	陈岱孙	陈洪进	陈虞孙	陈翰笙	张卓元

宋 涛	关人垠	关宛衣	江道涵	陈 元	陈山非	陈依冠	陈奕非	陈南工	张平立
张 穆	何建章	罗云焕	罗 璋	胡 绳	荣毅仁	姜君辰	姜椿芳	骆耕漠	饮本立

张稼夫	何建章	罗元铮	罗 琼	明 纯	宋毅仁	安君辰	姜惜万	熊新民	洪 立
李 楠	钱昌照	钱俊瑞	徐 寒	梅 芳	黄 逸	蒋一苇	褚葆一	蔡北华	薛 桥

秦柳方 钱昌照 钱俊端 徐雪寒 梅 益 黄逸峰 蒋一苇 相保一 蔡北平 薛暮桥

1982年重要经济学术会议简介

《经济动态》编辑部 李秀珍

中国劳动学会首届年会

时间: 1982年1月14日~19日

地点: 北京

主办单位: 中国劳动学会

参加人数: 100余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所有制; 劳动就业; 按劳分配、工资和奖金。

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第七次至十一座座谈会

时间: 1982年2月、5月、7月、9月、11月

地点: 北京

主办单位: 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国家科委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专业办公室、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全国世界经济学会、经济理论与方法组

参加人数: 150余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第七次会议: 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问题; 关于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如何协调发展等问题。

第八次会议: 关于技术协作和技术转让。

第九次会议: 从战略高度研究区域经济发展。

第十次会议: 科学技术与发展战略。

第十一次会议: 探讨农业经济发展战略。

价格理论讨论会

时间: 1982年2月2日~11日

地点: 云南昆明

主办单位: 中国价格学会

参加人数: 160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1. 稳定物价的问题。当前市场物价的动向和发展趋势; 稳定物价的理论依据和实现物价稳定的主要途径; 稳定物价和调整物价的关系。2. 价格体制改革和价格形成。

全国数量经济学第一次讨论会

时间: 1982年2月22日~3月3日

地点: 陕西西安

主办单位: 中国数量经济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陕西省科委、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西北大学经济系、陕西省数量经济研究会(筹)

参加人数: 150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1. 关于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

数量经济学问题。2. 关于更好地推广应用投入产出法的问题。3. 关于建立我国经济计量模型的问题。

4. 广泛开展经济预测。

中国生产力经济学会首届学术年会

时间: 1982年2月25日~3月4日

地点: 湖北武昌

主办单位: 中国生产力经济学会

参加人数: 143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生产力经济学一般理论; 生产力结构; 生产力布局; 经济规律问题。

工业经济责任制讨论会

时间: 1982年3月4日~9日

地点: 四川成都

主办单位: 财政学会、四川省经济学会

参加人数: 90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经济责任制的内容、实质和应当遵循的原则; 经济责任制的分配形式; 完善分配形式的具体意见。

学习陈云同志关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讲话

时间: 1982年3月

地点: 北京

主办单位: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

参加人数: 数十人

会议主要议题: 学习陈云同志在春节期间接见国家计委领导同志时关于加强计划经济的重要讲话。1. 陈云同志讲话的重要意义; 2. 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 3. 计划工作的经验教训; 4. 经济计划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5. 改进计划工作的建议。

财政与银行分工协作讨论会

时间: 1982年3月21日~26日

地点: 湖北武昌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

参加人数: 40多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财政与银行分工问题。1. 财政、信贷、货币发行需要实行分别管理。2. 关于成立中央银行问题。3. 关于中短期设备贷款问题。4. 关于加强财政与银行的密切协作问题。

中国企业家协会第三次年会

时间: 1982年3月26日~30日

地点: 北京

主办单位: 中国企业家协会

参加人数: 160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如何提高经济效益, 办好社会主义企业。1. 把经济工作转移到提高经济效益的轨道上来; 2. 开展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3. 从我国的情况出发, 总结经验, 创立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理论和方法。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修改中

几个理论问题的争论

时间: 1982年4月

地点: 辽宁沈阳

主办单位: 教育部

会议的主要议题: 1. 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对象问题; 2. 关于贯穿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主线问题; 3.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划分、基本特征问题; 4. 关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总体认识, 即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问题。

经济科技攻关座谈会

时间: 1982年4月2日

地点: 北京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参加人数: 30多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1. 经济科技攻关的重要意义; 2. 关于当前经济科学组织攻关的几点意见: 首先要选好重点研究课题; 必须把集体攻关和个人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 需要科学的组织和管理工作。

全国地区综合平衡统计科学讨论会

时间: 1982年4月17日~21日

地点: 辽宁沈阳

主办单位: 中国统计学会、辽宁统计学会

参加人数: 106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1. 地区综合平衡统计的特点、任务和指标体系; 2. 关于完善国民收入的计算方法、国民收入中的价格问题、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划分等问题; 3. 关于统计、会计和业务三种核算衔接和统一问题。

第三次成本理论讨论会

时间: 1982年4月21日~29日

地点: 湖北宜昌

主办单位: 中国成本研究会

参加人数: 150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如何降低成本, 提高经济效益。1. 降低成本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2. 经济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概念; 3. 成本补偿; 4. 成本范畴; 5. 成本计划考核指标。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第二届年会

时间: 1982年4月28日~5月2日

地点: 湖南长沙

主办单位: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

参加人数: 200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介绍工业、农业及其他战线运用系统工程的情况和取得的成绩; 今后如何进一步推广。

全国渔业经济座谈会

时间: 1982年5月5日~11日

地点: 湖北鄂城县、贵州市

主办单位: 全国渔业经济研究会

参加人数: 50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关于编写《中国渔业经济》问题; 关于开展渔业发展战略问题。

石油经济学术讨论会

时间: 1982年5月18日~24日

地点: 江苏无锡

主办单位: 中国石油学会

参加人数: 130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关于石油勘探、开采、运输, 以及海上石油开发等问题; 成立中国石油经济学会筹备组。

如何当好厂长讨论会

时间: 1982年5月23日~29日

地点: 江苏无锡

主办单位: 中国企业管理协会

参加人数: 70多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如何当好社会主义企业厂长, 并交流当厂长的经验。

商业经济效益讨论会

时间: 1982年6月2日~9日

地点: 湖北武汉

主办单位: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

参加人数: 284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成立大会。讨论的问题: 1. 什么是商业经济效益; 2. 讲究商业经济效益的重要意义; 3. 商业经济效益的特点; 4. 考核商业企业经济效益的指标; 5. 提高商业经济效益的主要途径。

广东省经济特区学术讨论会

时间: 1982年6月上旬

地点: 广东深圳

主办单位: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

参加人数: 100余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经济特区建设的战略意义、性质、模式、体制以及它的发展方向。

全国青年劳动就业学术讨论会

时间：1982年6月10日~13日

地点：四川重庆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

参加人数：80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解决劳动就业的指导思想；当前青年就业工作的重点；关于青年从事集体与个体经济等问题。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讨论会

时间：1982年6月19日~23日

地点：安徽合肥

主办单位：中国基建经济研究会、安徽省基建经济研究会

参加人数：50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对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的认识；可行性研究与基建程序的关系；项目评价的原则与方法。

农业计划问题座谈会

时间：1982年6月下旬

地点：北京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

参加人数：50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如何加强农业计划问题；调整农业结构的计划指导；农业计划应如何编制。

外贸亏损补贴问题讨论会

时间：1982年6月21日~28日

地点：上海

主办单位：中国财政学会、上海市财政局

参加人数：49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1.外贸亏损的原因；2.出口贸易中的假亏和真亏；3.发展对外贸易的目的性；4.关于发展对外贸易与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问题。

上海与兄弟省市(区)技术协作经济效益讨论会

时间：1982年6月29日~7月6日

地点：上海

主办单位：中国科协、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

参加人数：260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1.技术协作的战略意义；2.技术协作的经济效益；3.技术协作的性质和有偿转移；4.关于进一步开展技术协作的几点建议。

全国商业经营责任制理论讨论会

时间：1982年7月2日~11日

地点：北京

主办单位：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

参加人数：140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1.商业经营责任制的概念和内容；2.实行经营责任制的理论依据；3.实行商业经营责任制的原则；4.如何看待实行商业经营责任制后出现的问题；5.考核商业经营责任制效果的指标。

全国储蓄理论讨论会

时间：1982年7月2日~11日

地点：四川成都

主办单位：中国金融学会

参加人数：57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1.人民储蓄的新阶段；2.储蓄是否有物资保证；3.储蓄与积累、扩大再生产的关系；4.储蓄是不是“冤中虎”？

部分省市企业负责人座谈经济体制改革

时间：1982年7月6日~12日

地点：北京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管理》编辑部

参加人数：40余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部分省市企业负责人座谈体制改革中的一些问题：1.国营工业企业的性质、基本义务、基本权利；2.关于企业的隶属关系问题；3.关于工业改组、企业联合问题；4.关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5.关于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者利益关系问题；6.关于保持政策的严肃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加强经济立法工作；7.关于依靠内含扩大再生产的方针。

城市经济座谈会

时间：1982年7月27日~8月1日

地点：黑龙江牡丹江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

参加人数：37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科学性质及内容；研究方法；学习马恩关于城市理论的论述。

第一次《资本论》创作史学术讨论会

时间：1982年7月下旬

地点：吉林长春

主办单位：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吉林省《资本论》研究会

参加人数：60余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研究《资本论》创作史的意义；关于方法论问题；关于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问题；关于人的自由发展问题。

经济合同理论讨论会

时间: 1982年8月2日~8日

地点: 黑龙江哈尔滨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

参加人数: 75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经济合同的概念和范围; 经济合同的客观依据及其作用; 经济合同与经济计划的关系。

审计问题讨论会

时间: 1982年8月9日~16日

地点: 四川乐山

主办单位: 中国会计学会

参加人数: 140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1. 审计问题; 审计的概念、范围与方式; 审计与会计的关系; 审计与查帐有无区别; 审计与财政、银行、专业监督的关系; 建立审计制度的必要性。2. 经济责任制对会计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农业研究会联合召开1982年年会

时间: 1982年8月11日~16日

地点: 山西太原

主办单位: 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农业区划研究会、农业计划研究会

参加人数: 151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1. 综合农业区划中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的地位、作用、任务、内容及方法等; 2. 农村领域内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如何相结合; 3. 有关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国家计划和集体计划相结合, 指令性指标、指导性指标、征购基数、农产品价格等问题。

中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第二届年会

时间: 1982年8月11日~17日

地点: 黑龙江哈尔滨

主办单位: 中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

参加人数: 140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1.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的回顾; 2. 关于资金运动和货币流通问题; 3.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问题; 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社会主义经济的体制与经济制度。

全国财力分配问题讨论会

时间: 1982年8月11日~18日

地点: 吉林省吉林市

主办单位: 中国财政学会、吉林省财政厅、辽宁财经学院

参加人数: 77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1. 关于财力分配的几个理论问题; 2. 目前财力分配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3. 当前财力分散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首届年会

时间: 1982年8月

地点: 黑龙江哈尔滨

主办单位: 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

参加人数: 200多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1. 应该怎样认识技术经济工作者的责任; 2. 如何全面安排技术经济的研究课题; 3. 关于加强技术经济队伍的建设问题; 4. 有关研究会本身的问题。

抽样调查在农业方面的应用科学讨论会

时间: 1982年8月17日~21日

地点: 广东广州

主办单位: 中国统计学会、广东省统计学会

参加人数: 50余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1. 抽样调查在农业方面的广泛应用; 2. 农产量抽样调查的方法; 3. 农产量抽样调查中其他一些具体问题; 4. 关于处理好科学性与群众性的关系, 统一性与灵活性的关系, 全面统计与抽样调查的关系。

第二次全国民族地区财政研究会

时间: 1982年8月17日~24日

地点: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主办单位: 财政部、内蒙古等几个自治区财政学会

参加人数: 94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1. 对民族地区财政的认识; 2. 关于加速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 3. 关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自治权和调整一些财经政策的问题; 4. 关于民族地区的财政管理体制问题。

数理统计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应用科学讨论会

时间: 1982年8月23日~28日

地点: 上海

主办单位: 中国统计学会、上海市统计学会

参加人数: 62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 数理统计方法在统计调查、经济预测和质量管理等方面的应用。

中国工业企业管理教育研究会首届年会

时间: 1982年9月1日~9日

地点: 江西九江

主办单位: 中国工业企业管理教育研究会、江西省经委、中国工业企业管理教育研究会江西省分会

参加人数: 112人